

參考資料

- 葉洪生、林保淳，《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》（臺北：遠流，二〇〇五）。
- 林芳玫，《解讀瓊瑤愛情王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二〇〇六）。
- 陳國偉，《類型風景：戰後台灣大眾文學》（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二〇一三）。
- 陳國偉，〈當「推理」謀殺「偵探」——一個大眾文類方法論的思考起點〉，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》第二十九期，二〇一九年十月，頁九—三六。

字的繁花盛開
一九七九—一九九一

10

禁忌與逃逸

美麗島事件前後的
禁書故事

李淑君

專書出版的政治角力

幸好我自己也曾經在警總出版社編過《青溪》雜誌，我的老處長李世雄先生相信我的忠貞，他的一通電話要我立刻上街把發出去的雜誌，逐本撕去那篇介紹於梨華新書的文章。我和出版社的小弟，沿著重慶南路，向每一個書報攤說明，我是《書評書目》主編，裡面有一篇文章出了問題，必須撕掉，才能繼續銷售……啊，這就是台灣的七〇年代……（隱地，〈翻轉的年代〉）

一九七七年二月，《書評書目》裡有問題的文章是一篇來自香港的書評：清淮〈於梨華的新書〉。一九六〇年代，於



1986年，時報文化《郭良蕙作品集2心鎖》。



1985年，李喬《藍彩霞的春天》，五十年出版社。書封上下各有「限限心智成熟者閱讀」和「台灣第一部『妓女』文學」等標語。

不過，與性別相關的禁書，最常見的關鍵字還是「善良風俗」。一九八四年李喬在《民眾日報》連載《藍彩霞的春天》，寫身體被當成商品販賣的女性，在經歷痛苦、悲哀、認命，最後壓迫者起身反抗的故事，既是女性受壓迫，也是臺灣社會受壓迫的影射。小說後由五十年出版社出版之後，官方以「妨害善良風俗」為由將其查禁。一九八六年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「郭良蕙作品集」系列叢書，一併將郭良蕙在一九六三年被禁的《心鎖》重新出版，卻遭到二度查禁，二度「上鎖」，直到一九八八年才由省府新聞處發布解禁。

梨華先後以《夢回青河》、《又見棕櫚·又見棕櫚》等長篇小說風靡文壇。一九七五年文革尾聲，於梨華到中國旅行探親；一九七六年，於梨華將中國見聞結集為《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》一書在香港出版。因為文章盛讚冰心與其他「新中國」的婦女工作者，被當局視為「投共」而「冷凍」，也因此，即使是書評，都成為有問題的文章。

美麗島事件前後的查禁圖書，與對「新中國」的態度有關，也與島內的「和諧」有關。一九七七年九月，吳濁流《波茨坦科長》中譯本（遠行出版），便因涉及戰後的劫收以及二二八事件，被以內容不妥查禁。一九七八年，宋澤萊在吳濁流創辦、鍾肇政主編的《台灣文藝》發表小說《打牛浦村：笙仔與貴仔的傳奇》，被批評為醜化臺灣社會、破壞祥和，小說集《打牛浦村》出版後，連同《台灣文藝》雜誌一起被列為軍中禁閱書刊。一九八三年，宋澤萊以二十三頁的長文〈人權文學巡禮——並試介臺灣作家施明正〉，作為施明正小說集《島上愛與死》的序言，因為將臺灣社會形容為監獄的處境，又談及監牢內的「教化」等問題，被警總認定「內容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，嚴重淆亂視聽」，直接導致《島上愛與死》被查禁。

一九七〇年代的臺灣婦女運動，也同樣被當局放置在相似的脈絡裡。一九七六年，拓荒者出版社成立，翻譯出版美國暢銷書《性+暴力》（Against Our Will），這本考察女性受害歷史的專書，在出版後隨即遭到查禁。曾以「拓荒者」為筆名的呂秀蓮表示「那個時候從事婦女運動的難度，實在不亞於政治運動」，當時的婦運被視為「意在動盪社會，尤其製造國民黨統治階級間夫妻的反目成仇，好便利於臺獨活動」。

雜誌的不斷刊策略

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，同年《臺灣政論》創刊，到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前，政治依然嚴峻但黨外雜誌繁花盛開：《這一代》、《美麗島》、《富堡之聲》、《春風》、《夏潮》、《鼓聲》、《八十年代》系列、《關懷》、《深耕》、《生根》、《臺灣年代》、《鐘鼓樓》、《蓬萊島》、《前進》系列、「自由時代」系列、《關懷》等接續出刊。這時期的臺灣先後經歷中壢事件、橋頭事件、美麗島事件、林宅血案、陳文成命案，觸及臺灣政治議題的出版品動輒得咎，此時的政治氛圍如同黨外的一則比喻：是罩在玻璃瓶中的蒼蠅，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卻找不到出口，充滿可能卻又壓抑苦悶，黨外雜誌在出版、查禁、接續出版的情況下突破重圍。

一九七七年創刊的《這一代》因〈特權向法律挑戰〉的社論，遭停刊一年的處分。一九七九年《八十年代》因禁書與言論自由、臺灣前途、民主教育危機等議題而遭停刊。同年標示「新生代政治運動」的《美麗島》雜誌創刊，多次刊載黨外活動、黨外政論，後遭查禁而停刊。陳鼓應創辦《鼓聲》雜誌，有〈「民主牆」與「愛國牆」〉一文記錄「民主牆」與「愛國牆」論戰；宋澤萊〈該是農民說話的時候〉討論農業、農村、農民等議題；許達然〈從諺語看臺灣史〉深化本土文化，《鼓聲》在創刊號後即遭查禁。標榜「社會的、鄉土的、文藝的」《夏潮》，強調第三世界視角與工農議題，於一九七九年遭停刊處分。《春風》重

視工農權益，強調「永不妥協地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，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，和大家共同努力奮鬥」，然而一九八〇年三月第二期則因為美麗島事件而遭停刊處分。一九八〇年林宅血案後，七月《暖流》甫出刊即遭停刊一年，九月《鐘鼓樓》創刊號仍在印刷廠裝訂即被查扣。

面對連綿不斷的查禁與停刊，黨外雜誌發展出從監控查禁中逃逸的策略。例如鄭南榕創辦雜誌，便向親友借用大專畢業證書來當雜誌發行人，預先登記多張雜誌執照，使得一九八四年創刊《自由時代》系列週刊不會因為遭到警備總部停刊而斷期，陸續以「先鋒



1985年4月，鄭南榕總編輯，《民主天地週刊》第5期，自由時代系列總號第56號。

時代週刊」、「開拓時代週刊」、「民主天地週刊」、「公論時代週刊」等，換名稱不換版型，自一九八四年三月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連續發行五年八個月，共計三百零二期，歷經四十次停刊、百餘次查禁，卻依然持續不斷出刊。隨後由許榮淑接辦《深耕》、康寧祥的《八十年代》系列、《新潮流》等雜誌紛紛跟進此方法。黨外雜誌在查禁嚴峻局勢下闖關突圍，不因查禁停刊而斷期的行動策略，也展現了「大江東流



1988年5月《台灣新文化》20期「我們看到了獨立」專輯，為雜誌的最後一期。發行人王世勛，社長林文欽。

擋不住」的氣勢。

一九八〇年代遭查禁的還有《台灣文藝》、《台灣文化》、《台灣新文化》等文化雜誌。《台灣文藝》一九六四年由吳濁流創辦，一九八三年由陳永興接辦，一九八四年第九十一期「王詩琅專輯」遭查禁。這一期有林雙不〈大學女生莊南安〉、王世勛〈土地〉、明哲〈獄中回憶〉等作品，其中明哲為柯旗化之筆名。

一九七六年出獄的柯旗化，在書店看見《台灣文藝》有多首批判政府的政治詩，因此萌生以筆為刃的想法，除寫作支援外，另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創辦《台灣文化》季刊，與陳芳明在美國主編的《台灣文化》雙月刊，攜手合作，互通

有無。《台灣文化》季刊創刊號以〈美麗島的春天〉為刊頭詩，期許「從此人人自由／從此人人平等」；一九八七年第四期因為刊登悼亡詩〈母親的悲願〉與社論〈二二八事件的反省〉觸及二二八議題，加上〈黨化教育與民主教育〉和〈國民黨會放棄校園控制嗎？〉批判國民黨政權的教育政策，遭到查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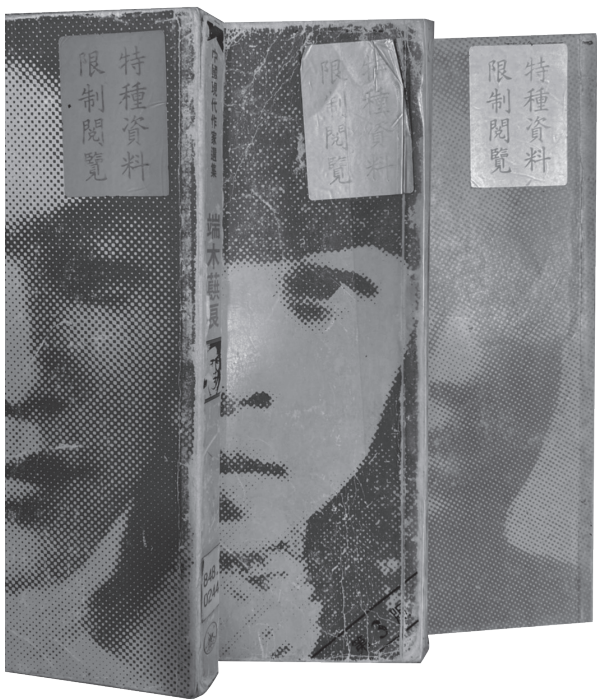
當高雄「第一出版社」催生了《台灣文化》季刊，臺北則有「前衛出版社」支援《台灣新文化》月刊的創辦。相較於柯旗化的「謹言慎行」，以林文欽、宋澤萊、利錦祥、林雙不、高天生、王世勛為主的編輯群更加「有話直說」。一九八六年九月創刊的《台灣新文化》，既宣傳「臺灣民族主義」又推動「臺語文字化運動」，陸續刊有吳濁流觸及二二八事件的《台灣連翹》（節選）、林雙不長篇小說《決戰星期五》（節選）、宋澤萊的臺語小說〈抗暴個打貓市〉、林央敏寫獨裁者之死的〈大總統千秋〉等小說，創下印行二十期，被查禁十六期的紀錄。

鍾肇政主編期間的《台灣文藝》（一九七六—一九八二）影響了柯旗化，也影響了呂昱。呂昱在一九八四年出獄前，曾以莘歌在《台灣文藝》發表小說〈畫像裡的祝福〉。一九八六年十月，呂昱創辦《南方》雜誌，以第三世界的全球南方觀點為核心，作為學運的平臺，既讓學運發聲，也讓各種「反省」的聲音得以在這個雜誌平臺上對話。為了讓校園間的資訊更快速流通，《南方》雜誌在一九八七年三、四月陸續編製《南方增刊》免費贈送讀者，引起大學行政人員和教官群的抵制，隨即收到臺北市政府新聞處公文要求停止散發。

解嚴就解禁了嗎？

一九八七年七月臺灣本島解嚴，但直至一九九二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，才終結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。因此一九八七年解嚴，並不意味言論真正自由與民主。例如呂昱策劃，由鍾肇政的台灣文藝社出版的《金陵春夢》八冊，由於為國民黨和蔣家如何失去大陸，提供了一個八卦版的非官方說法，因此在一九八七年雙十節出版後，即遭新聞局控告；一九八八年，《台灣新文化》因刊登史新義〈我們都是台灣民族的兒女（上）——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簡史〉與林旺〈誰的國文？誰的歷史？——從國中、高中課本看國民黨洗腦術〉，被以「散布分離意識，鼓吹臺灣獨立，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，違反出版法規定」為由，予以停刊六個月處分。

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間，謝里法《重塑台灣的心靈》（自由時代出版社）、陳芳明編著的三書《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》、《在美麗島的旗幟下：反對運動與民主台灣》與《在時代分合的路口：統獨論爭與海峽關係》（前衛出版社）皆遭到查禁。一九八九年，黑名單工作室《抓狂歌》臺語專輯中的〈民主阿草〉一曲，歌詞寫道「歸路的警察與憲兵」，因飽含政治批判而遭禁播。同年，鄭南榕因刊登許世楷〈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〉，被控「涉嫌叛論」遭法院傳喚，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，鄭南榕在四月七日自焚，以肉身對抗政治監控與言論查禁。



1988年，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端木蕻良、蕭紅、鄭振鐸等「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」，來臺後仍被貼上「特種資料／限制閱覽」。（圖片來源：張俐璇攝自臺大圖書館）

一九九〇年代發展的同志、情慾議題，也尚在解嚴後面臨監控。一九九五年，陳雪的第一本小說集《惡女書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便被要求以膠膜包覆，並標注十八歲不宜等字樣。一九九六年，由正傳公司出版的「國內第一本探討性心理醫學書籍」《性幻想》遭臺北市府新聞處查禁；同年創刊的男同志雜誌《G & L 熱愛》，內容亦曾遭舉發。憲法賦予人民的出版自由，一直要到一九九九年《出版法》廢止才落實。

回首美麗島事件前後的出版來時路，出版史、閱讀史與查禁史三者相互影響，在疊床架屋的查禁法規與政治控制中闖關與逃逸，出版行動與政治突圍並進，在政治高壓下，展現出版策略的動能與接續不斷的戰鬥。

參考資料

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，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，《走向美麗島：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，一九九九）。

廖為民，《我的黨外青春：黨外雜誌的故事》（臺北：允晨，二〇一五）。

廖為民，《解嚴之前的禁書》（臺北：前衛，二〇二〇）。

廖為民，《國民黨禁書始末》（臺北：前衛，二〇二一）。

鄭順聰，〈在台灣文化的最前端——前衛出版社〉，《文訊》三〇九期，二〇一一年七月，頁三八三—四〇〇。

隱地，《漲潮日》（臺北：爾雅，二〇〇〇）。

宋澤萊，〈談台灣文學系所以及愛荷華國際寫作班〉，「台文戰線」部落格，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八日張貼，<https://twncub.ning.com/profiles/blogs/3917868:BlogPost:38342>。

陳正維，〈「拓荒者」的多重實踐：論七〇年代婦運者與女作家的書寫／行動〉（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，二〇

一一）。

李靜玫，《〈台灣文化〉、〈台灣新文化〉、〈新文化〉雜誌研究（一九八六・六一—一九九〇・十二）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二〇〇八）。

王信允《書寫發聲與運動實踐：解嚴前後〈南方〉的邊緣戰鬥與文化批判》（臺中：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二〇一四）。

張海靜〈自由與挑戰：〈出版法〉廢除後的觀察與思考〉，《文訊》，一九九九年一月，頁二二—一五。

本文感謝禁書作家廖為民、南方雜誌社創辦人呂昱接受訪談，拍字文化工作室黃佳平騰打逐字稿。

字的繁花盛開
一九七九—一九九一

11

現實感與小奇蹟

從新興詩刊到文學雜誌

楊宗翰

珍貴的「在野」特質

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刊物，堅持「在野」允為臺灣現代詩刊最珍貴的特質。印量偏少與流通困難，讓詩刊在出版市場從未獲得過巨大成功；但就算再怎麼艱辛，詩刊仍然坦蕩走著非主流路線且屢仆屢起，為小眾讀者守護一方詩歌園地。

據張默編《台灣現代詩編目》所錄，自一九五二至一九九一年，這四十年間臺灣竟誕生了超過一百五十種現代詩刊。若以本書第三篇「冷戰後期」為時域起迄依據，從一九七九年《掌門》、《陽光小集》創刊到一九九一年《蕃薯詩刊》與《世界詩葉》問世，統計這段期間共有五十六種詩刊崛起，數量不可謂之不多。

這些詩刊與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創